

法国是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尽管1964年中法联合发表的建交公报只有44个字,其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博弈。最终,两个在两极世界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成功导演了一场“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缘何被称为“外交核爆炸”

有官方色彩的私人访问

开启中法友好关系大门的使者,是一位面相斯文的法国老人——埃德加·富尔。

1963年8月20日,富尔利用去瑞士度假的机会造访了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并面见毛泽东、周恩来。富尔1957年到中国时,这两位领导人曾与他见面。请示外交部后,李清泉转达了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对富尔的邀请。这也是未建交国家友好人士以私人身份访华时,中方的惯用作法。孰料,富尔忽然神秘地告诉李大使,此访有官方色彩,因为他要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但行程仍须保密,对外宣称只是私人举动。

张锡昌当时在外交部法国科工作,他眼中的富尔是个“在野,但能通天的人物”。本是公开的私人访问,却号称带着隐秘的官方目的,富尔的态度让中国外交人员有些困惑。

同年10月21日,张锡昌到深圳罗湖迎接富尔夫妇。张锡昌迫切想搞清楚这个“明里私人,暗中官方”的老头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然而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接待人员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话题引上正路。“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以法国总统特使自居,携有戴高乐的一封信,将面交我国领导人。”接收到这种“微妙信号”的中国政府,悄悄提高了接待富尔的规格。乘专车抵京后,他和夫人直接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事后,富尔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提到,“中国官方表现出对来访者的高度关切和信任。由于他们坚持遵循谨慎的态度,每项考虑都有其限制,各种举止有细微差别,却又不失联系。”

戴高乐放不下那份高傲

中苏分歧是法国承认新中国的推手之一。1964年,时任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表示,“直到去年为止,世界

共产主义还是铁板一块,只要与惟一的一个首都建立关系就可以决定共产主义各国的命运。如今,中国与苏联分裂,就有必要同北京直接对话,对其态度应当像对苏联一样,也要像承认苏联那样承认中国。”

另一方面,1963年的法国已是“戴高乐的法国”。这位身高1米95的大鼻子男人,是一位兼具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二战后,他立志重振“高卢金鸡”的雄风,不愿继续扮演华盛顿的小跟班。戴高乐的回忆录显示,他履任之初便提出了四项外交目标,与中国建交为其中之一。此外,越南的乱局让戴高乐相信,法国重塑国际形象的机会来了。他深信,“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虽然打算主动与中国修好,戴高乐并不情愿放弃法国人的骄傲。富尔被引见给周恩来时,对青年时代赴法留学的后者说“是时候再到巴黎了”。用如此委婉的方式传递信号,正是戴高乐亲口交待的。1963年9月26日,他在给富尔的信中强调:“严格讲,我们无求于人。”

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富尔也表示,“遵照您的指示,我明确指出我们不是请求者,我们没有迫切的理由去改变现状,只是为明显的异常表示遗憾。”由此,富尔特别向中方提出:“将要作出的决定不应包含任何前提条件,这将侵犯我们的自尊,与我们非要求者的身份不符。”

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指台湾问题。

“在铁板上撕开裂缝”

11月初,富尔带着与中方达成的默契踏上归途。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启动了正式建交谈判。

1964年新年到来时,中法建交已呼之欲出。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的

班底中,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人此时仍被蒙在鼓里,只能借助媒体的猜测和坊间传闻捕风捉影。直到1月8日,戴高乐才突然通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法中建交问题,达官显贵无一缺席。闭门讨论进行了两个钟头,散会时,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成为法国政府内部的共识。

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评论称,朝鲜战争以后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换种更形象的说法,中法建交犹如“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裂缝”。

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档案称,他“情绪激动”,责怪法方“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美方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

解密的法国外交档案则显示,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按照戴高乐的指示回复称:“法国认为北京政府已存在了14年,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权威是不容争辩的,它代表着中国6.5亿人口,这些人口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作用构成一个政治事实,即不得不重视北京政府。”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他还盛赞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光辉文化,“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为了照顾西方盟友的情绪,他解释说,法国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然而,他又颇有深意地谈及,“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面对法国的“背叛”,美国的反应则如同青春期少年的家长:既对其日益壮大的独立意识心怀不满,又因为不想破坏“家庭团结”而无法公然阻止和干涉。1964年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感慨:“我们同法国的关系犹如又甜又酸的杂拌。”(据中青在线)

中法两军首次交流秘闻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公告发表后,双方紧锣密鼓的开始了使馆开馆的准备工作。中国派出了以宋之光为临时代办的筹备组筹建在法国巴黎开设中国大使馆,法国派来了以克劳德·沙耶为临时代办的筹备组在北京筹建法国驻华大使馆。

使馆准备好,中国派出黄镇将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法国派来吕西安·佩耶为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并与1964年5月31日向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递交国书到任。武官处成立后,中方任命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秉玉大校为驻法国使馆海陆、海、空武官,法国任命准将纪业玛为驻华使馆陆、海、空武官。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后,法国军方通过我驻法使馆武官处提出开展中法两军交往的愿望,希望中国在1974年春天派出解放军体操队访问法国。中国接受了法国军方的邀请,在1974年3月组成了以空军文化部副部长李明天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体操代表团。在出访准备工作正常进行的时候,传来了法国正在上演《中国人在巴黎》的电影。这是一部歪曲事实,胡编滥造,造谣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的电影,为此,中国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向法方提出交涉。中方在交涉中严正驳斥,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军队攻占巴黎的事情,倒是有法国军队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希望法国停止反映这部污蔑解放军,歪曲历史的影片,因为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接受的。经过多次交涉,法国以新闻自由,无权干预为由没有做到我们的希望。鉴于这样的原因,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体操代表团出访法国是不合时宜,也是不能去的,就这样中法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往就因为法国的一部歪曲事实、造谣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电影而流产。

1975年,法军方向我驻法使馆武官处再次提出,希望中国派军队射击队访问法国。中国决定派解放军体育运动办公室张全昌为团长,解放军射击场主任董瑞光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代表团一行20人出访法国进行友好访问和开展交流,并与1975年10月12日到达法国巴黎,开始中法两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交流。

(据凤凰网)

中法建交插曲:美从中作梗

既然建了交,互换大使是必须的。作为临时代办的宋之光,率队到巴黎打前站。出发前,邓小平特意见了他,嘱咐此行的首要任务是“驱蒋”,如长期无法解决,中国就会撤回代办,宋之光甚至为此准备了留和走的两套方案。其实,此刻的戴高乐更焦急,如果台方代表执意留在巴黎,导致“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法国政府只怕会成为国际笑柄。

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的书面指示中言辞严厉,称“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当天,法国政府就通知台湾当局,称即使台方不先采取

主动措施,法国仍将断绝与台方的“外交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将在近期内实现。台方“外交部”则于次日声明反对中法建交,指责戴高乐的政策是“分期投降”。面对北京的持续施压和台方对“劝退”的充耳不闻,法国政府惟有选择摊牌。2月10日,法国外交部明确告知台方,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抵法,“中华民国”的使领馆将失去存在的理由。翌日凌晨,台方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

台方外交人员虽已撤走,却不肯放弃乔治五世大街的馆舍,专门派人把守。中国先遣队决定另找地方,用于临时办公。经多日奔走,他们看中了巴黎

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带花园的三层洋房。原房主是一位意大利军火商,负债自杀,将债务和房子留给了美籍的夫人。谁知,中国外交官刚以110万美元买下房子,突然生了变故:房主变卦了。原来,美国情报人员威胁女房主,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人,就永远不许她入境。没主意的遗孀吓得痛哭流涕,几欲毁约。经宋之光反复劝说,她才如约交房。先遣队随即展开安全检查,结果在客厅一角发现了窃听器,只是安装手法相当业余,大概是女房主在美国情报人员威逼利诱下勉强装上的。既然及时发现和清除了,中国外交官也就不再追究。

(据凤凰网)